

# 中国农民工研究的四种范式及评析 ——作为移民、准市民、工人和劳动者的农民工

徐法寅\*

(深圳大学, 广东 深圳 518061)

[摘要] 中国农民工数量的持续增加也使得相关研究与日俱增。但是, 由于农民工现象的复杂性,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界定和分析, 并使得农民工研究不够全面。为了解这些研究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从对农民工的界定出发, 区分出当前农民工研究的四种主要范式: 移民范式、城市化范式、阶级形成范式和劳动体制范式。虽然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和所使用的概念存在交叉重合, 但是这四种范式在根本上对农民工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它们分别将农民工界定为“移民”、“准市民”、“工人”和“劳动力”。进而, 它们关注了不同的核心问题, 采用了不同的概念框架。不过, 四种范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也为未来更综合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尤其是, 虽然劳动体制范式还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农民工研究范式, 但是劳动体制范式可以综合性地对农民工现象所涉及的制度、政策、行为、动机、态度和行为进行客观分析, 从而揭示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 进而为城市化和阶级形成等问题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农民工; 移民; 城市化; 阶级形成; 劳动体制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5) 02-0031-12

## 一、中国农民工的界定及其研究范式

农民工现象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国家统计局(2014)的最新调查, 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6894万人; 而且,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农民工的数量一直持续增长。“农民工”作为一个研究话题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农民工”这个词语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性词汇, 关于农民工的很多研究已经跳过“概念界定”环节而直奔主题了。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的界定问题不重要了。恰恰相反, 关于农民工性质的想当然的本体论假设却是经验研究的最根本内容, 因为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选择(Boudieu, 1991; Archer, 1995)。

事实上, 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的界定并不统一。总体而言, 可以区分出三种界定方式。首先是产业界定。比如, 吴海峰(2009)认为, 在从传统农业浓重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农民会逐步脱离乡村土地, 转变为准产业工人(农民工), 并进而转变为正式产业工人。何美金和郑英隆(2007)也认为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的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者形态。

\* [收稿日期] 2014-12-12

[作者简介] 徐法寅, 美国肯塔基大学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发展。

其次是身份界定。沈立人(2005)认为农民工是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人群。注重农民工身份的界定方式更多地强调农民具有农业户口,但是他们从事非农业活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刘传江,2004;Cai & Chan, 2009)。第三是行为界定。围绕其行为特征,关注其打工生活,农民工往往被称为“打工者”(工友之家,2013;王颖,2005)。但是,具有价值诉求的研究者往往从价值的层面上区别“农民工”、“打工者”和“新工人”等词语的社会影响,而没有将“打工”作为其行为特征而对农民工进行客观界定(比如,吕途,2012;汪勇,2007)。由于大量第二代农民工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中国工运研究所,201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2009),以及农民工的身份界定也超越了户口所界定的范围(Zhan, 2011;黄锜,2011),所以产业界定和身份界定已经不足以全面描述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了。因此,农民工可以更为客观地以其行为特征为基础,并综合身份和产业界定的元素而进行界定。如此,农民工是以其特有“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人群。

但是,如何理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呢?如何解释他们的不断增加的数量呢?他们的前途又如何呢?现有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是正是由于“多个角度”的存在,这些研究只关注农民工现象的某些侧面,因此不足以全面地分析农民工现象。本文力图在对农民工进行客观界定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研究范式进行剖析。上面这个以行为特征为基础对农民工进行的界定,不仅力图客观地描述农民工的外在特征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力图包含农民工生活特征的多个方面。但是,当前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农民工生活特征的某一个侧面而对其进行界定;这也影响了他们的问题选择。根据他们所做出的概念界定、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可以区分出关于农民工的四种研究范式:移民范式、城市化范式、阶级形成范式和劳动体制范式。移民范式侧重农民工的迁移行为,从而将农民工视为“移民”进行研究;城市化范式则强调农民工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从而将农民工视为“准城镇居民”和“准市民”进行研究;阶级形成范式则集中考察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与资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将农民工视为“工资工人”进行研究;最后,劳动体制范式关注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和主观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或者“劳动者”进行研究。在对四种研究方式进行详细说明之后,本文认为四种研究范式在研究问题和概念使用上存在互补性。尤其是,劳动体制范式虽然还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但是可以更综合地对农民工现象所涉及的制度、政策、动机、态度和行为进行客观分析,从而解释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进而为城市化和阶级形成等问题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本文的分析从农民工的界定出发,并找出农民工研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框架。因此这里所说的研究范式超越了现有文献综述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而且本文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加深理解这些研究问题也具有批判反思意义。比如王毅杰和王微(2004)在区分国内流动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时,提出了社会分层与流动、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网络、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五种视角。但是这里的五种视角仅仅是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分析。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范式来看,这五种视角不过是将农民工视为“移民”的移民范式中对其迁移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同样,谭深(2004)所作出的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中,区分出了均衡范式、结构—历史—功能主义范式、以及“主体—实践”范式。但是该综述仍然关注农民工的“流动问题”,这

也不过是本文所说的移民范式的一个总结。梁波和王海英（2010）所做的城市融入问题的文献综述，在本文的研究范式来看，只涉及到城市化范式中所提出的一个具有价值倾向的研究问题。

### 二、中国农民工研究的四种范式

在讨论四种研究范式之前，首先做三点说明。首先，四种范式下的经验研究问题存在融合，比如户籍制度和农民工现象的关系在四种范式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为了说明四种范式的区别，本文主要关注各自的核心问题，因为这些核心问题使得同样的概念和问题在不同的范式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次，由于旨在说明四种范式的区别，本文无意穷尽各个范式中的所有问题，而是关注其核心问题。最后，本文集中讨论研究范式或者研究视角，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逻辑。

#### （一）移民范式

农民工生活状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的迁移，甚至是频繁的迁移。他们离开农村村落，去往城镇。而且，由于很多农民工持续地处于流动当中，尤其是在家乡和工作地之间往返，因此他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循环流动（Wang, 2005; 李强, 2012）。对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关注使得移民范式将他们视为“移民”进行考察。以对农民工的“移民”界定为逻辑出发点，以移民理论为基础，移民范式所提出的研究也都围绕着迁移行为的相关问题展开，主要关注收益成本计算、家庭结构、土地租用状况、社会网络、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地域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对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影响。就其核心研究问题而言，移民范式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背景。

首先，移民范式关注农民工的迁移动机。在众多的移民理论中，关于移民动机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移民文化理论、行为理论、新经济学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等（Messay et al., 1993; Samers, 2010; Boyle et al., 1998）。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中，很多定量研究将移民理论中相关的变量纳入到统计模型中，以理解农民工的迁移和回流行为（比如，Hare, 1999; Lee & Meng, 2010）。由于强调个人理性选择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不足以解释各种迁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农民工的迁移动机研究开始转向家庭和文化因素。在对农民工迁移动机的研究中，两种主流的解释框架是永久迁移意愿（permanent migration）和家庭策略（household strategy）理论。永久迁移意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农具有“将家庭成员带到城市并在城市定居的意愿”（Fan, 2008: 1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城市定居意愿”是作为动机或主观意识而言的，而不是其实际的居住状况（叶鹏飞, 2011）。大量的经验研究也表明部分农具有城市定居意愿；而且这种意愿的强烈程度有所不同（Li, 2006; 叶鹏飞, 2011; 熊波、石人炳, 2009）。另外，对具有迁移意愿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在迁移过程中的不同经历会使得他们的迁移目的地可能不同于他们现在的工作城市（Zhu, 2007; Zhu & Chen, 2010）。与永久迁移意愿理论不同，基于新经济学理论的家庭策略理论将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并认为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是家庭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选择；而且这种家庭策略也涉及到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策略（Fan, et al., 2008; Fan, 2008）。与增加收入渠道和降低市场风险相关，家庭策略理论也关注家庭的相对剥夺或者家庭在社区中相对地位的变化；也就是说，农民工的迁移行为不仅与家庭结构相关，也与社会背景和社区状况相关（蔡昉、都阳, 2002; 李培林, 2003）。

其次, 移民范式对迁移的客观背景的研究是以对迁移动机和迁移原因的区分为基础的。前者指迁移行为背后的价值导向, 而后者是指迁移行为发生的客观条件, 即为何迁移能够成为实现其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果农民工的迁移动机研究主要是对农民工迁移行为进行解读, 对农民工迁移的结构背景的研究则主要是对其进行解释。在移民理论中, 解释迁移行为的理论包括推拉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虽然作为经典迁移理论的推拉理论已经备受批判, 甚至不再被提及, 但是其后的迁移解释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推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比如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对流入地劳动力需求的分析可以视为对拉力因素的一种细化。就中国农民工而言, 两种主要的结构性差异影响了他们的迁移行为; 而且这两种结构差异的形成又与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历史背景相关。第一个结构性差异是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就存在着制度化了的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之后, 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及其制度因素并没有很大的改观。这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制度, 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Whyte, 2010; 黄锜, 2011)。此外, 这种城乡差距体现在基础设施、就业机会、收入水平、教育设施等多个方面 (Larus, 2012; Sicular et al., 2010; Hannum, et al., 2010)。无论农民工的动机是永久迁移还是家庭策略, 这种城乡差距都使得从农村向城镇迁移成为满足他们需求的手段。第二个结构性差异是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之前, 地区之间的发展是相对平等的;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 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Tsui, 1991; Gallagher, 2007; Fan & Sun, 2008)。这种地域之间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农民工从不发达地区向更为发达地区迁移的趋势。

## (二) 城市化范式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迁移和“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是农民工生活状态的另两个显著特征。如果前者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那么后者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研究范式就强调农民工产生的这两个背景。而且由于农民工总是在城市中生活一段时间, 这种范式主要关注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及其城市化的前景。需要说明的是, 与移民范式不同, 城市化范式具有价值倾向, 即根据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工业化进程会导致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 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被看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黄锜, 2011)。在这种价值关怀之下, 城市化范式将农民工界定为“准城镇居民”或者“准市民”。在这种界定之下, 城市化范式对农民工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通过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对农民工的产生进行解释, 以及通过对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考察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进行探索。

在宏观层次上, 这种具有价值导向的研究范式不仅描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征, 而且对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政策进行了批判分析。农民工被视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与其他国家相同,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与其他国家不同,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中国没有根除传统的农村居民, 也没有发展出正式的市场机制和法律框架来取代传统的社会制度, 而是采取了“不完全的城市化”道路, 从而降低了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成本。其结果就是大量“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出现 (Chan, 2010)。这种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状态被称为“城市化不足”现象 (Chan, 1994; Sjoberg, 1999; Chan, 2010)。这种城市化现象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相关。Meng 和 Manning (2010) 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道

路，并认为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客人体制”（guest system），而印度尼西亚城市化过程却导致了大量的城市穷人。这种“客人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呢？因为这种城市化道路涉及到对居民迁移进行的控制。这尤其体现在户籍制度的持续存在上。首先，这些农民工在农村仍然享有土地承包权、房屋建筑权和其他一些社会福利；其次，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村居民在城市中工作；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给予这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Chan & Buckingham, 2008; Chan, 2009; 蔡昉, 2010）。从本质上讲，户籍制度是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户籍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因此，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也受中国人口结构、技术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调整。因此，“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及其对国家政策的挑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蔡昉, 2007; Kwan, 2009; Knight, et al., 2011）。

在微观层次上，这种范式关注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态和态度。其价值取向使得这个层次上的研究使用了具有价值判断性的词汇，比如“社会融入”和“市民化”。这些词汇都假定了农民工未来应该具有的生活状态。城市化范式考察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而说明他们的社会融入状态，并进而批判性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或城市融入的制度安排。所谓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工的整体生活方式（包括生产、生活、价值观念、身份认同）从传统农村类型向现代城市类型转变的过程。因而城市融入过程不仅仅包括生产、生活和文化上的空间转换，而且包括他们主观上身份和认同的转换。而且城市融入的这些方面还被分成融入状态的不同层次，比如物理空间上的转换是最浅层次，而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转换是最深层次（江立华, 2003; 杨瑾, 2008; 王兴周、张文宏, 2008; 梁波、王海英, 2010; 李强, 2012）。正是这种价值判断性的“社会融入”概念，使得这种范式对农民工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判断：农民工在城市中过着边缘化的生活。这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体现在多个方面：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资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劳动权益没有保障，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包括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权利等；生活条件恶劣，往往集中在“城中村”的违法建筑中；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斥（Wong et al., 2007; Zhan, 2011; 郭立场, 2011; 当前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 2011; 吕途, 2012; Madrazo & Kempen, 2012）。

### （三）阶级形成范式

农民工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在城市中是工资工人。工资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权益都受到他们与雇佣者和政府的互动关系的影响。这也使得阶级形成范式将它们视为“产业工人”、甚至“无产者”，并考察他们的利益意识和集体行动。虽然阶级形成理论几经变化，笔者认为这种范式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这个核心命题（Marx, 1963; 1995），即从客观存在的遭遇剥削和异化的工人群体，向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群体的过渡。其后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体系论者都没有脱离这个基本问题，虽然更多的社会文化因素被整合进了这个基本框架中（Lee, 2007; 陈周旺、汪仕凯, 2013）。李路路等（2012）区分出了当代社会学中阶级分析的两种分析思路：将阶级视为集体行动者的“结构—意识—行动”分析思路和将阶级视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的“结构—状况—选择”分析思路。这两种分析思路与阶级形成的核心

命题相对应：前者关注自为阶级的形成过程，而后者关注自在阶级的客观存在。因此，有理由像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将阶级的形成视为一个双重的过程。同样，阶级分析范式也关注农民工作为自在阶级的存在和作为自为阶级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与城市化范式相同，阶级形成范式也具有价值取向：农民工在生产与市场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会导致他们的自我组织和反抗行为。

就农民工作为自在阶级而言，沈原（2006）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是发生在波兰尼所说的“第一次大转变”和布洛维所说的“第二次大转变”的交汇点上，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借用塞尔维尔的说法，他认为农民工的产生可以用“卡尔·马克思模式”的阶级理论进行解释，而原国有企业职工可以用“卡尔·波兰尼模式”的阶级理论进行解读。塞尔维尔本人也应用其工人运动理论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认为中国将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Silver, 2003; Silver & Zhang, 2009）。就自在阶级的存在而言，“无产化”，“商品化”和“剥削性”是工人阶级长期存在的三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没有商品化，无产化和剥削性就会变成奴隶制或封建制关系；没有无产化，工人阶级就不会稳定存在或者很难形成阶级意识；没有剥削性，阶级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农民工的存在依赖于他们的商品化，也依赖于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契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契约的转变（Lee, 2007; Friedman & Lee, 2010）。另外，农民工也经受着剥削，包括延长劳动时间，侵犯劳动权益，降低和拖欠劳动工资，降低劳动条件等等（Lee, 2007; Chan, 2001）。但是，农民工并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尤其是他们在农村拥有土地租用权，因此这些农民工只是“未完成的无产化状态”（Ngai & Lu, 2010; Lee, 2007）。即便如此，在劳动商品化的过程中，或者农民工成为工资工人的过程中，他们在市场和工厂中都处于不利地位。

就农民工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而言，阶级形成范式关注农民工的利益意识和集体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个阶级或者一个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它的行动能力，而这种行动能力的存在又依赖于它将自己界定为一个阶级或者一个群体（Bourdieu, 1987）。从另一方面说，阶级意识的发展阶段和强弱程度是通过阶级行动表现出来的，因此阶级意识的研究也主要是通过分析阶级行动进行的，这也是中国农民工研究的主要策略，即通过研究农民工的集体反抗来分析他们的阶级意识。总体而言，用来测量阶级意识发展阶段和强弱程度的指标包括集体行动的诉求、形式、过程、规模、话语和密度等。因为以下某个或某几个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扩展其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1）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法律所限定的利益，宣称并追求自己所界定的权益，（2）农民工也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劳资纠纷仲裁程序而采取了游行、静坐和罢工等集体行为，（3）农民工的集体组织也超越了个别的经济组织而将多个工厂的工人联合起来，（4）农民工在集体行动中（并通过借鉴各种政治话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Lee, 2007; Chris Chan, 2009, 2010; Chan & Ngai, 2009; Ngai & Lu, 2010）。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体现出了以上特征，但是这些集体行动仅仅是特殊事件，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而存在，因为（1）除个别案例外，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集体行动都是自发行为，而不是有计划的理性行为，（2）这些集体行动都是暂时性的，而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行为，（3）即使某些集体行动涉及到了多个厂家，但是其中并没有协调组织，

(4) 与农民工存在的时间和数量相比, 集体行动的数量仍然是相对较少的, (5) 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调整相关制度和措施, 因而可以容纳这些集体行动 (Ahlers & Schubert, 2011; Chan & Siu, 2012; Lee, 2013)。

### (四) 劳动体制范式

最近的中国农民工研究中, “劳动体制”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以上提到的各种范式中, 都有研究使用了“劳动体制”(labor regime)这个术语。比如在移民范式中, C. Cindy Fan (2004; 2008)使用了“农民工劳动体制”(migrant labor regime)的概念; 在阶级分析范式中, 沈原(2006)也强调“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对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使用, 而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 这种对“劳动体制”概念的引入, 本身说明了这些关于农民工研究的三种“常规范式”已经不足以解决农民工的一些典型问题了。

也就是说, 一种范式的存在依赖于其典型问题的存在, 那么劳动体制范式的典型问题是什么呢? 或者说, 前面所提到的三种范式不足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前面提到的三种研究范式进行批判性分析可以说明“劳动体制范式”的必要性和含义。移民范式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农民工的迁移决定和结构性原因。但是, 移民范式并不能解释农民工为什么没有进行完全的迁移而是处于循环流动状态中; 而且, 即使不能进行完全的迁移, 他们仍然在城市中辛勤劳作。城市化范式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但是, 即使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 大量的农民工仍然没有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益; 而且, 即使他们没有完成城市化成为城市居民或市民, 他们也仍然继续在城市中工作。阶级形成范式主要考察农民工作为工资工人而进行的集体行动, 但是这些行动仍然不足以使他们成为一支独立的、持久的政治力量。因此, 我们可以说, 三种范式都隐含着这样一个悖论: 一方面, 三种范式都认为农民工现象是一个过渡现象, 他们会通过迁移、城市融入或者集体行动而迅速地定居于城市, 同化于城市文化或者争取到平等权益; 另一方面, 在三种范式已经对农民工开展了三十多年的研究之后, 农民工群体依然存在, 而且其数量仍然在上升。这样一种悖论可以称之为“事实的理论绑架”, 即三种视角带着“转型”的视角(农民工会很快消失)去研究一个长期存在的、不断增加的农民工群体。

无论农民工群体何时会消失, 这个群体存在并扩大的事实要求我们超越价值预设, 从而客观地解释其存在的事实逻辑, 而且要在事实逻辑的基础上对理论逻辑进行批判分析。“劳动体制”的概念就代表着客观地解释农民工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的一种范式。但是, 当前的研究中, 劳动体制仍然没有作为一种范式而存在。在移民范式中, “劳动体制”往往作为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制度背景而存在 (Fan, 2004; 2008); 在阶级分析范式中, “劳动体制”的概念也仅仅被看作一个对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范本 (沈原, 2006)。但是,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范式, 劳动体制范式将中国农民工视为“劳动者”或者“劳动力”, 考察这些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待这种生活态度的态度, 并将它们的生活状态和主观态度放在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因此, 其核心问题是: 中国农民工是否和如何接受了社会制度所形塑的生活方式, 从而维持这个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的? 这种范式与迈克尔·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理论直接相关, 因为他的理论不仅关注在劳动过程中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的, 而且考察工人为什么和如何服从资本控制。布洛

维还区分出以强制为基础的专制政体和以说服为基础的霸权政体，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生产政治的连续谱。此外，这种生产政治的变迁也受到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影响（Burawoy, 1985）。

就中国农民工研究而言，李静君的研究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她本人并没有将“劳动体制”作为一种范式看待，而且她本人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劳动纠纷和劳工运动问题。李静君将“劳动体制”的概念应用于中国工人反抗活动的研究中，认为“对于将国家的劳动管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场所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能力联系起来而言，布洛维的劳动体制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Lee, 2007: 21-22）。其次，在其专著 *Against the Law* 的第六章中，她综合考察了限制农民工发起反抗行为的因素。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她也在回答农民工为什么接受了打工的生活方式。那里，她关注的问题超越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产活动，而考察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打工生活方式。她认为，农民工的打工生活是一种双重存在，即同时生存在城市和农村中，而且这种双重存在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维度。农民工将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既看做一种责任，又看成一种保障；农民工的婚姻、房屋和教育都在农村中进行，因而农村是他们进行长期投资和社会再生产的场所；而且他们的农村生活也受到农村制度和政策变迁的影响。另外一个典型研究是九十年代潘毅（Pun, 1999）所做的关于打工妹身份认同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女性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之后，在工作场所的互动中发展出了“女性”、“农民”、“农民工”、“打工妹”等相互重叠而又模糊不清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她却没有认为这些打工妹或者打工群体形成了一个阶级群体。此外，他们也将打工妹的生活状态和身份认同与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虽然潘毅后来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了阶级分析视角，但是这项九十年代的研究却力图从总体上分析农民工在其生活状态中所形成的主观认同。可见，劳动体制范式超越了迁移决定、城市融入和阶级反抗等范畴，将农民工作为“全人”进行考察，从而将国家政策、市场制度、生活状态和主观态度结合起来。

### 三、中国农民工研究范式的评析

作为总结，这一部分首先对四种范式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价值取向进行评析，然后说明四种范式在这些方面的互补性和交叉性为它们之间的综合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另外，与其他三种范式相比，劳动体制范式可以更加综合性地对农民工现象所涉及的制度、政策、动机、态度和行为进行客观分析，从而揭示农民工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并进而为城市化和阶级形成等问题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首先，就中国农民工的事实而言，四种范式的研究问题具有互补性。每一种范式的界定都不足以涵盖农民工的诸多特征，因此它们的解释也不足以全面地分析农民工现象；因此，对多种范式进行综合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农民工现象。比如，农民工的迁移以“循环流动”为特征，但是，仅仅关注“为什么迁移”或“迁移动机和原因”的移民范式却不足以解释迁移决定作出之后的流动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说，城市化范式对于农民工在城镇里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融入的分析则能解决这个问题。当前的移民分析却仅仅将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一个结构背景来对待，而没有将他们的城镇生活视为整个移民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城市化范式主要从社区的角度对农民工的城镇生活状态进行研究，比如对北京“浙江村”的社区研究所描绘的流动人口在北京所经历的权力竞争和社会网络（Zhang, 2001；项飏，2000）。但是，这种城市化范式却没有对具体工人的生产活动

和工作场所中的社会互动给予充分重视（沈原，2006）。而阶级形成范式则更加关注工资工人的生产活动及其对他们生活状态和主观态度的影响。面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孤立性和暂时性问题，劳动体制研究则更加注重农民工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现象，并力图综合分析国家政策、工作场所互动、工人生活状态和主观态度。

其次，四种范式的解释框架有很多交叉之处。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地域不平等发展结构、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的变迁、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组织制度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足、以及社会网络的作用等问题经常出现在各种范式之中，只不过这些因素用来解释的问题在不同的范式中是不同的。这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客观条件，也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的城镇生活状态，也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的阶级地位和利益意识的形成，还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但是研究范式之间的分化却不足以全面分析这些结构或制度因素对于农民工现象的总体影响。

再次，就价值取向而言，四种范式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城市化范式和阶级形成范式具有更加强烈的价值取向。所不同的是，城市化范式是一种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认为农民工应该融入到城镇空间、经济、政治、文化和认同中；而阶级形成范式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商品化会使得农民工遭遇不公平待遇（甚至是剥削），而且他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会使得它们采取集体反抗以争取他们的正当权益。相对而言，移民范式和劳动体制范式是更加客观的研究视角。所不同的是，移民范式所关注的范围更加狭窄，即仅仅关注迁移行为的动机和原因，而劳动体制范式则从更综合全面的角度描述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及其与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

因此，四种范式在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价值取向上既具有互补性，又具有交叉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分裂甚至对立却造成了农民工研究的三个问题：第一，对农民工现象的片面性解读，即各个范式可能仅仅强调农民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或者说农民工的某些特征；第二，对结构或制度因素的不充分分析，即在各个范式中，同样的结构或制度因素只用来分析某一两个具体问题，而没有充分考察它们对农民工现象的整体作用；第三，理论分析和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即某些范式（尤其是城市化范式和阶级形成范式）带着某种价值取向对农民工进行研究，使得它们不能对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进行解释。这些问题都对综合几种范式提出了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和交叉性也为它们之间的综合提出了可能性。

最后，与侧重考察迁移动机和原因的移民范式相比，劳动体制范式可以更加综合地考察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具有价值取向的城市化范式和阶级形成范式相比，劳动体制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描述和分析，并为它们提供事实基础。也就是说，劳动体制范式可以更加综合地对农民工现象所涉及的制度、政策、动机、态度和行为进行客观分析，从而解释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并进而为城市化和阶级形成等问题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但是，与其他三种范式相比，“劳动体制”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虽然“劳动体制”这个概念已经被用来分析农民工的迁移行为、生活状态和集体行为。因此，在未来的农民工研究中，劳动体制范式应该取得足够的重视，以弥补三种主流范式在解释力上的不足，并进而对三种范式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

## [参 考 文 献]

- [1]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4)
- [2]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J].经济动态,2010(12).
- [3] 陈周旺,汪仕凯.工人政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 [4] 当前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边缘化生存: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J].宏观经济研究,2011(1).
- [5] 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OL]. <http://sri.iyyun.cc/plus/view.php?aid=29..2013>
- [6] 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OL].2014.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 [7]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 [8] 何美金,郑英隆.农民工的形态演变: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性的研究[J].学术研究,2007(11).
- [9] 黄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0]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程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1]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12] 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M].人口与发展,2010(4).
- [13] 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J].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 [14]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 [15] 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 [16]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在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2).
- [17] 王兴周,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 [18] 王毅杰,王薇.国内农民工研究的理论视角[J].当代中国研究,2004(1).
- [19] 吴海峰.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9).
- [20] 熊波,石人炳.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这[J].人口与发展,2009(2).
- [21] 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2).
- [22] 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 [23] Ahlers, Anna L. & Gunter Schubert, 2011,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Reviving Legitimacy: Lessons for and from China." Pp. 61-81 in Deng Zhenglai and Guo Sujian (eds), Contemporary China: Identifying Zones of Legitimacy Building.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24] Bourdieu, Pierre,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17.
- [25] Burawoy, Michae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26] Chan, Anita,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 [27] Chan, Anita & Kaxton Siu, 2012,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p. 79-101 in Beatriz Carrillo & David S. G. Goodman (eds.), China's Peasants and Workers: Changing Class Identitie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28] Chan, Chris King-Chi, 2010, The Challenge of Labo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9] Chan, Chris King-Chi, 2009, "Strike and Changing Workplace Relations in a Chinese Global Factory."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40(1): 60-77.
- [30] Chan, Chris King-Chi & Ngai,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8: 287-303.
- [31] Chan, Kam Wing, 1994,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2] Chan, Kam Wing, 2009,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2): 197-221.
- [33] Chan, Kam Wing, 2010, "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 *The China Review* 10(1): 63-94.
- [34] Chan, Kam Wing & Will Buckingham, 2008,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582-606.
- [35] Fan, C. Cindy 2004, "The Stat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Maiden Workers in China." *Political Geography* 23: 283-305.
- [36] Fan, C. Cindy 2008,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37] Fan, C. Cindy & Mingjie Sun, 2008,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06."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9(1): 1-20.
- [38] Fan, C. Cindy & Wenfei Winnie Wang, 2008, "The Household as Security: Strategie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Pp. 205-43 Russell Smyth and Ingrid Nielsen (eds.), *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New Jersey, NY: World Scientific.
- [39] Gallagher, Mary Elizabeth, 2007,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0] Knight, John, Deng Quheng & Li Shi,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585-600.
- [41] Kwan, Fung, 2009,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cidence of Surplus Labor: Experience from China during Reform."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7(3): 341-61.
- [42] Larus, Elizabeth, Freund, 2012,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43] Lee, Ching Kwan,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44] Lee, Leng & Xin Meng, 2010, "Why Don't More Chinese Migrate from the Countryside?" Pp. 23-45 in Xin meng and Chris Manning (eds.), *The Great Migr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45] Madrazo, Brenda & Ronald van Kempen, 2012, "Explaining Divided Cities in China." *Geoforum* 43: 158-68.
- [46]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 J. Edward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3): 431-66.
- [47] Meng, Xin & Chris Manning, 2010, "The Great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 Trends and Institutions." Pp. 1-19 in Xin Meng, Chris Manning, Li Shi and Tadjuddin Noer Effendi (ed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n*.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 [48] Pun, Ngai,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2:1-19.
- [49] Pun, Ngai & Lu Huilin,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5): 493-519.
- [50] Samers, Michael, 2010, *Migr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51] Sicular, Terry, Yue Ximing, Björn A. Gustafsson & Li Shi, 2010, "How Large is China's Rural-Urban Income Gap?" Pp. 85-104 in Martin King Whyte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52] Silver, Beverly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3] Silver, Beverly J. & Lu Zhang 2009, "China as an Emerging Epicenter of World Labor Unrest." Pp. 174-87 in Ho-fung Hung (ed.),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54] Whyte, Martin King, 2010, "The Paradoxes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1-25 in Martin King Whyte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55] Wong, Daniel Fu Keung, Chang Ying Li & He Xue Song, 2007,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Living a Marginalized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6: 32-40.
- [56] Zhan, Shaohua, 2011, "What Determines Migrant Workers' Life Cha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ukou,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Market." *Modern China* 37(3): 243-85.
- [57] Zhang, Li, 2001,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58] Zhu, Yu, 2007,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Habitat International* 31(1): 65-76.
- [59] Zhu, Yu & Wenzhe Chen, 2010,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 (4): 253-267.

#### **Four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Migrants, Semi-Urban Residents, Workers, and Laborers**

*XU Fa-yin*

**Abstract:** There are increasing studies of migrant workers as the increasing siz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e complexity of migrant worker study in China forced the researchers to study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 or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a certain facet of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the author puts these studies into 4 paradigms: migrants, urbanization, class-making, and labor-institutions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treated as migrants, semi-residents, workers and laborers respectively. The four paradigms focus on different facets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rameworks and set up some approaches to study migrant workers in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labor-institutions paradigm is not a mature paradigm yet, but it provides a possible research framework to study migrant workers comprehensively covering most of the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s, policies, motiva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etc. Such comprehensive study can more objectively explain the increasing large siz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ast decades in China and therefore benefit the studies of the mi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class-making paradigm in China.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Migration theory, Urbanization, Class-making, Labor institutions